

试论泰山封禅的传播意义

杨 颖

世界各古老民族的神话思维中，巨山大川通常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山是众神居住之地。在中国，‘五岳’、‘四渎’历来享受着君王的祭祀，代表了天帝和各路神灵的意志。而从传说中的无怀氏、伏羲氏，到秦皇汉武以降的历代封建帝王，尤其对五岳之首的泰山青眼有加，甚至将滥觞于秦，固定于汉的‘泰山封禅’奉为封建王朝的国家祭祀大典，更是已经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从哲学史、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观照，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意味深长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而如果引入传播学视角，我们将能够清楚地描绘出泰山封禅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播行为的轨迹，从而获得对其全面的认识。

岳·五岳·东岳

先民向对大山充满敬畏之心。这首先是因为陡峭险峻、绵亘几十数百里的大山难以攀缘逾越，从而直接限制和划定了先民的生活区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创世神话中，山川草木俱是民族始祖的化身。如《述异记》所载：“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山从最初就有着人格神的倾向。而如果升格为“岳”，就更与天帝和人君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据《尔雅·巡狩》云：“岳之为言角，角考功德”，《风俗通》云：“岳者，角考功德、黜陟幽明也”。角的意思是角力、比较，那么“岳”的本义当是考评功过得失。不论部落首领还是奴隶制、封建制帝王，都是特定的氏族或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使被统治者顺服，他们都宣扬自己与上帝的亲密而直接的关系。自己的功过得失，对诸侯的陟罚臧否都要报告上帝，请上帝评判。这种“报告”的仪式通常就选择在高山之巅举行。一座普普通通的山由此成为“角考功德”之地，也就得到了“岳”的称号。

《尔雅》、《说苑》、《白虎通》等书对五岳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不管具体何指，五岳又各自有其象征意义则是毋庸置疑的。《白虎通·巡狩》云：“东方为岱宗者，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南方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言万物护也。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西方为华山者，华之为言获也。万物成熟可得获也。北方为恒山。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为嵩山，言其后大之也”。中华民族最初繁衍生息之地的五座大山就这样成为万物蕃育和人民农耕生活的象征性符号，从而所有与五岳相关的文化和历史现象也都必然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味。

五岳之中，一致的都以泰山为东岳。泰山又有许多别名。如《书经》、《礼记》中称岱宗，《周礼》称岱山，《尔雅》称岱岳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叫法，与古人心目中的泰山形象

有关。古人认为东方之山以泰山为最高，所以尊为东岳。东方是日出的方向，是先民所谓“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之处。所以又称泰山为岱山。“岱”，《风俗通》就解释为“始”。泰山地位如此尊崇，被奉为“山之尊”，顺理成章地就又有“岱宗”之称，因为“宗”就是“首、长”之义。从名字上看，古人就已经把泰山当作了群山之首。

巡狩与柴告

《管子·牧民》中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派的论文总集，值得注意的是，齐人不仅认为“祇山川”是顺民之经，而且明确提出“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这表明他们已经明确认识到“祇山川”这一举动的传播意义。实际上“祇山川”也已经制度化，就是所谓的“巡守”之制。

巡守也写作“巡狩”。据《礼记》、《风俗通》、《孝经》等书记载，古天子有“五年巡守”之制。《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风俗通》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自亲行之也。所以五岁一出者，盖五岁再闰，天道大备也。”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巡守的目的是为了使道德太平“远近同化”。

夏商周三代之君，乃至上溯至传说中的无怀氏、伏羲氏、炎帝、黄帝等，都曾有巡守之举。氏族部落时期，生产手段原始，交通落后，人们的生活范围狭窄。彼此之间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氏族血缘关系的排外性而甚少人员往来和信息沟通。较强大的部落打败、吞并了弱小部落之后，首领巡视四方，可以使自己的威仪政令闻于天下，有利于同化人们的思想，迅速巩固对新获得的土地和人民的统治。

奴隶制建立以后，统一的帝国疆域更为广大。分封制的实行使诸侯王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空间，这样天子的巡守从客观上一则可以炫耀中央的权势，二则可以视察各诸侯领地的政治状况；从主观上来看，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天命”思想宣扬天子受命于上帝，宣传奴隶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天子带同官员和仪仗队出巡，祭祀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每岳皆至”，实际就是在表演与上帝的沟通，借助上天的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从地理位置看，天子巡守所及的岳渎多在各诸侯国境内。但是在奴隶制礼乐制度规范之下，诸侯是没有资格也去巡守、祭祀一番的。只有到奴隶制渐趋解体，周天子王权衰落的时候，才出现了诸侯祭祀泰山的越礼行为。所以以维护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发出了“泰山不如林放乎”的感叹。意谓泰山有神，是不会享受非礼之祭的。

天子五年巡守一次，是因为“五岁再闰，天道大备”，也是为了要与上帝保持步调一致。每到巡守之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巡守的第一站是东岳泰山，而巡守的一个必要手续就是“柴告”。天子每到一地，必然“先柴是燔”。我们知道，烟、火等诉诸视觉的传播手段在远古时代可以说是快速而有效的。周朝时有完备的烽火报警系统，昼则举烽，夜则举火，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信息传到远方。巡守时的“燔柴”也是为了传播信息，但传播的对象是上天。即所谓“祭天告至”。就是告诉上帝，天子已到某岳，将要向上天报告诸侯功绩了。据《礼记》疏，祭天时的“燔柴”是在祭坛之上架起柴火，然后将祭祀用的玉和牺牲置于柴上烧烤，“使气达于天”。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柴告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其客观上的受众当然是诸侯和普通人间百姓。巡守时仪仗队的行进已经在沿途传布了天子出巡的消息，而

柴告时的烟火又进一步强调了与神秘莫测、权力无边的上帝相联系的内容。无疑，柴告因此成为以神力的巨大威慑为后盾的一种强有力的信息发布行为。所以在五年一次的巡守活动中，柴告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如果天下太平，天子巡守到泰山时就进行封禅。天下不太平，就只是巡守而已。太平年代的柴告意味着表彰诸侯功绩，不太平的时候，可以想见，柴告就传播了一种充满威胁意味的信息。流传至今的民间祭灶风俗是用麦芽糖粘住灶王爷的嘴，使他“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平安”。在“天命思想”统治的先秦时候，统治者正是利用人们畏惧天降祸福的心理，以“柴告”这样一种简单的手段有效地传播了天子与上帝交通、君权神授不可违抗的信息。

封 禅

天子巡守必先到泰山。据《孝经》记载，如果天子太平，就将举行封禅典礼：“封乎泰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所谓“封乎泰山”，就是在泰山顶上封土为坛。“考绩燔燎”是指考察诸侯功绩并以燔柴燎牲的方式报告上天。所谓“禅乎梁甫”，梁甫即梁父，是泰山脚下的小山。禅，原字为“禫”，本义是祭祀的场地。在梁父山除地为禫，祭祀地，就是“禅”。“刻石纪号”，拽的是刻石为文，记录天子功德。由此我们知道，封禅是一种祭祀典礼。封是祭天，在泰山上举行，禅是祭地，在泰山脚下的小山上举行。举行过“禅”的山很多，如云云、亭亭、社首、梁父等。但封禅并称，往往偏指泰山上的祭天仪式。

《白虎通》解释封禅说：“封者，增高也，禅者，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著己之功德以自效也”。班固主持编辑的《白虎通》反映的是东汉时庸俗经学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统治哲学。其封禅观念也是为这种哲学所统率的。这在后文将有所论及。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它所提供的事实性的东西。即举行封禅的帝王将“己之功德”刻在石头上。有信史可征的如秦始皇刻石，表彰自己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功绩，希望自己的“大义休明”能够垂于后世，更要求子孙后代万民“尊奉遗诏，永承重戒”。以山石为媒介的文字传播虽不能传远，却可以传久。秦始皇希求不朽，当然选择将名字刻入石头。而后代上疏奏请封禅的文士佞臣也认识到不刻石就“无以显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观”，所以泰山刻石之盛蔚为大观。这也构成了今天泰山旅游重要内容的人文景观。封禅刻石确实显示了纵向传承文化的传播功能。

当然封禅本身就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白虎通·封禅》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始交之处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顺其类也”。文中三次出现“告”字。根据帝王的主观意愿，根据封禅典礼本身的宗教神学意味，前两个“告”的对象当是上天，后一个告的对象则是化育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但实际接受这种告知的当然是统治秩序之内的各级官僚和人民。那么与前文所论的巡守一样，封禅活动的传播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封禅观念嬗变

最早记载封禅活动、阐述封禅观念的典籍是《管子》。但《管子·封禅》原篇已亡，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所引的管子之言。齐桓公称霸以后，“会诸侯于葵

丘而欲封禅”，管仲想劝阻他，就列举了他所记的十二家封泰山的古天子，如无怀、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及至周成王等，说明只有受命于上天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齐桓公不过是诸侯身份，没有资格举行这种典礼。但齐桓公认为自己“九合诸侯，一医天下，诸侯莫违”，“昔三代受命之王”也不过如此。管仲作为臣下当然不能指责桓公僭越，只好“设之以事”，说古代封禅的时候都有比目鱼、比翼鸟、三脊茅等祥瑞出现，而“今凤凰麒麟不来，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鸣鸟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这才令桓公打消了封禅的念头。管仲之劝桓公是不欲桓公做非礼之祭，而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早已不把周礼放在眼里，之所以放弃封禅完全是因为没有出现所谓祥瑞。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社会发展过程是缓慢的，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官方哲学思想的演进并不总是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一致，有时甚至相对滞后。在齐桓公的时代，为奴隶制服务的天命思想势力仍然很大。桓公多次召开诸侯大会，其个人气质中充满了颐指气使的霸气，但一谈到上天，他气焰顿消。这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其时的封禅观念。周礼规范下的封禅，其核心是人君和天帝的交通。而在这个交通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天。人君受命于天，其统治必须得到上天的承认。天致太平，降下祥瑞，于是人君行封禅礼以报天。封禅仪式在泰山举行，泰山是“阴阳交代”，万物更始之处，最主要的，泰山被认为是东方最高的大山，“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这样在传说中的先秦时代的封禅活动中，泰山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的角色，作为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东岳，负载了报告太平、报答上天的信息。

有史可征的封禅活动始于秦始皇。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基本上采纳了韩非法家的政治学说。韩非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天命鬼神之说的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秦始皇却迷信神仙方士，希望长生不老。他在巡行天下、炫耀武功的同时多方寻觅神仙之踪、不老之药。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荒谬，但好生恶死本是人类天性，先秦时候唯心主义思想家宣扬不死的神灵的存在，冶金工艺和化学知识的发展又使炼丹术士有了技术上的保证，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始皇受到深刻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应该看到这种迷信与周王朝奴隶制社会的天命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秦始皇只求仙药长生，并不像周天子那样认为自己的帝位是上天赐予的。所以李斯等人与秦始皇议功德，说：“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反映在其封禅观念中，就是秦始皇并不以封禅为交通天帝，而更多地是作为传播自己威仪的手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登封之前也曾经召集鲁儒计议封禅之礼，但计议未成，秦始皇也就径上泰山，而鲁儒也只能借他下山途中遭遇暴风雨而暗中讥刺而已。这也可见在其时作为国家祭祀典礼的封禅礼尚未形成，单纯的封禅行动也还并未进入封建王朝官方传播体系。

秦始皇封禅不是为了向天帝报太平，而是为了“颂秦德”。其泰山刻石径称“皇帝临位”而不言天命，刻石一是宣传自己的功德，二是为了将其“法式”流传后世，“化及无穷”，其传播目的是非常明显的。秦始皇封禅是没有天帝的位置的。在这个传播结构中，泰山仍是媒介，而传播对象则是天下百姓和后世子民。

始皇封禅观在整个封禅观念的嬗变历史中，因其浓厚而明确的指向现世的传播意识而独树一帜。在他之前，管仲思想所反映的周礼体系中的封禅观念讲天命，封禅是沟通上天与帝王。在他之后，汉武帝时候，封禅观念又回归到天命。封禅仍是沟通上天与帝王。不过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为封建集权统治服务的天命。同是有人格、有意

志的上天，在先秦是维护奴隶制帝王，在汉王朝则是维护封建制帝王。

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是以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为政治思想基础的。汉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临朝，仍然好黄老，黜儒术。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亲政，汉王朝历经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已经大大地发展了生产，如何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汉武帝笃信道家的炼丹长生之术，宠信术士，但为了统一思想，维护政权，他又重用儒家文学之士。公元110年封泰山之前，汉武帝一面孜孜于神仙不死之术，一面安排群儒筹划和进一步完善整套的封建国家祭祀典礼，其中也包括封禅大典。但“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最终汉武帝受到“宝鼎”出世的鼓励，采用郊祀泰一之礼前往封泰山。但汉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而且“其事皆禁”。这很可能是相信天帝的他听信了齐人丁公的话：“封者，合不死之名”。他不能确定自己能否不死，又深信秦始皇“不得上封”是因为天帝降下风雨。他恐怕自己计议经年的封禅大礼也遭遇天神之怒，所以才这样战战兢兢。

从汉武帝首次登封泰山的情况看，他把封禅作为接近天帝，祈天帝眷顾的神圣仪式。而这个仪式却是秘密进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次封禅行动只是他的个人行为，而且其传播功能较之秦始皇也大大减弱了。

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哲学背景，董仲舒改造天命说，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并在其五行说中提出“应天改制”的思想，从而封禅不仅在其外在仪式上得到了固定，而且也获得了一个确定的“顺天应命”的宗教神学内涵。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泰山封禅固定为国家祭祀大典。在此后接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各朝各代都有帝王举行这一典礼，或至少派遣官员前往泰山祭祀。对泰山的重视也不断升级。许多皇帝给泰山争上封号以示尊崇。明太祖朱元璋虽将前代所上封号一概去除，却是基于泰山乃“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非“国家封号之所可加”。这无疑是一种变本加厉的尊奉。

与泰山封禅直接相关，汉以后泰山文化现象最显著的就是写给泰山看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些官方或非官方文章包括了铭、记、赞、颂、议等各种文体，它们的发表有着不可忽视的传播意义。尤其到宋明，举凡祈雨、祭祀、征讨、水旱灾变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皇帝都会发布“告泰山”文，这种类似新闻发布的文章借助泰山神灵而大大增加了告知的力度。在泰山封禅已经固定为国家常设的祭祀典礼而失去了新闻性，削弱了传播功能的时候，封建帝王发布的告泰山文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缺陷。

纵观泰山封禅史，泰山作为勾通天帝与人君的象征性符号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传播意义。其主要传播功能就是以全能的神力为后盾，向天下臣民传布君王的威仪功德和纲纪政令。尤其在两汉时代，经过改造的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西汉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创立了天人感应理论，东汉班固所编的《白虎通德论》建构了一整套的宗教神学世界观，把神学的自然界秩序和现世的封建统治秩序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内部必然要维持高度统一的思想 and 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没有信息的有效流动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除了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建立和维护一整套统治秩序之外，借助“幽微莫测”的天道宣扬天子的意志不可违抗，统一人民的思想，对于巩固集权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而泰山封禅正是官方传播体系中这样一种登峰造极的传播形式。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99 级研究生

主要参考书目：

《尔雅》、《礼记》、《史记》、《白虎通德论》、《管子》、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